

理论研究·实践研究

●朱天俊

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目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特别是近10年来,目录学虽在“困惑和冲突”中发展,但取得的成果仍不可低估。目录学理论、历史、方法诸方面的研究均有新的进展。大量目录学论文的发表,一些教材、专著的相继出版,就是这一进展的表现。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发表的目录学论文有1695篇,是1949~1979年30年间的6.1倍;出版目录学论著17种,比前30年总和还多4种^{〔1〕}。这一时期,目录学人才辈出,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老中青结合的目录学研究的教学队伍已经形成,这是目录学未来的希望。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什么?目录学向何处去?不少同志在思考,本文就此作如下几个问题的探索,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一、突破固有观念,加强 目录学理论建设

目录学,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时间内,被看作是“目录之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目录学也是发展的。中国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代。在古代,目录学包含在广义的校讎学内。《七略》、《汉志》所形成的编纂目录的传统,贯穿于古典目录之中。中国古典目录学以研究目录为主,这是很自然的。近代西学东渐,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现代文献编纂也有了新的发展,文献检索工具已不只是

限于目录单一类型。索引、文摘、辑录、综述相继产生,发挥着传递文献、知识、信息的作用。提要是构成目录的要素之一,古已有之,现在也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发行与宣传之中。文献检索早已不限于查考目录。文献检索与情报检索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使目录学内容得到充实和发展。近年来,对目录学的理解,国内已有一些新的提法。陈光祚提出的“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一说已远远超越“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的范围了。目录学是“目录之学”的固有观念,已被突破。那种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看法,只是目录学是“目录之学”的延伸与解说,似可商榷。

目录学理论建设从何加强?

1. 从学术文化高度科学总结中国目录学遗产。研究目录学遗产,既包括对丰富的、多种类型、多种功用目录的评述和历代编制目录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古典目录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目录学产生与发展的缘由,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现实的借鉴意义。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下大功夫,从认真发掘与整理中国目录学史料做起,经过考订辨析,加以系统整理,编写历代书目解题,撰写多卷本的中国目录学史。

2. 注意与加强比较目录学的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目录学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文化的一面镜子。要了解不同国家目录学发展的民族特点,也要了解不同国家在

各个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对于什么是西方目录学;尤其在理论方面,若明若暗。对于苏联目录学了解得多些,但也很肤浅。近年来虽有文章介绍和译著出版,但总的说,认识还不系统深刻。至于日本目录学研究状况了解得更少,而日本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很深入的,其中包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有着显著成就。要进行国外目录学研究,就要编译资料。这一步不迈出,比较目录学研究无从谈起。开展比较目录学研究,可了解各国目录学所长,有分析的加以吸收,充实中国目录学;又可进一步认识中国目录学优于国外目录学之处,系统地向国外介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3. 开展对当前编纂文献与文献情报工作的研究。中国图书馆界过去看重书目参考工作服务。近10年来,图书馆界、科技情报界又广泛地开展了文献情报服务,并取得显著的效果。迫切需要总结经验,从中提炼出目录学理论,推动文献情报服务工作。把文献情报服务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与当前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发展专科目录学,加强应用目录学知识的普及。

4. 尽早求得中国目录学体系的共识。关于建立中国目录学体系问题,有些论文、教材中已有所涉及,但对什么是中国目录学体系,提法不一。有的提目录学原理体系,有的提目录学理论模式。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目录学体系是指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体系。此点,目前已有多种思路,几种看法。例如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目录学概论》。上编是目录学基础知识,下编是目录学的应用技术。编者是把目录学史作为目录学基础知识看待的,归属于上编。这是一种体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电大教材《目录学》,则是依基础理论——方法技术——组织管理的结构体系展开^[2]。将目录学史知识穿插到有关部分讲授,这又是一种体系。1991年曾令霞则认为当代目

录学仍处于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指出经验要素、理论要素、方法要素和结构要素四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目录学的科学体系。她把这一体系又归纳为两种模式:反映学科形成、进化过程的本体论框架与反映书目工作流程的过程论框架。按前者,她认为现已形成理论目录学、应用目录学、专科目录学^[3]。事实上,反映书目工作流程的知识可寓于学科本身形成之中,二者似可统一。

什么是体系?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4]。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由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历史和目录学方法组成。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目录学理论是目录学历史发展与目录学方法诸多经验的抽象、概括与系统化。目录学历史乃是在一定学术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在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与总结。目录学方法则是在历代与当今编纂文献与利用文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工作准则与规范化。由于研究的需要,目录学又可分为若干分支,与目录学理论、历史、方法共同形成目录学的体系。这些分支有的是目录学本身派生出来的,例如比较目录学;有的则是与其它学科结合形成的,例如各种专科目录学。目录学究竟按哪种标准与研究需要分哪些分支,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但观点相同、相似的多于相异的,相信通过讨论,可以取得共识。

建立现代目录学科学体系不能不考虑它与传统目录学的关系。目录学有着明显的民族文化色彩和时代特点。中国现代目录学不能脱离与传统目录学的联系。要经过研究,从传统目录学中取其精华,将其优良传统融合到现代目录学之中。这样,现代目录学的体系会更具有中国的特色。这里需要的是探索、继承与创新。

在建立中国目录学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吸取、参考、借鉴外国目录学长期形成的学科体系。但不能照搬,照搬只能阻碍或延

缓中国目录学科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二、联系学术文化，深入传统目录学研究

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起源较早，《通志·校讎略》和《校讎通义》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最早的系统理论著作。本世纪30年代，不少学者通过目录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姚名达的《目录学》与《中国目录学史》、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以及蒋伯潜《校讎目录学纂要》等。这些著作有继承郑、章传统目录学，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有以中国目录学为主要内容，并注意吸取西方目录学，将固有的目录学知识与图书馆编目知识融于一书的；也有突出图书分类沿革，以此阐述目录学基本知识的；还有将目录学与校勘学结合为校讎目录学的。这些著作多数则侧重中国目录学史。

50年代，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分别编写过《普通目录学讲义》。60年代初，两系合编《目录学讲义》，1982年又合编《目录学概论》，中国目录学史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近10年，各地出版了一些目录学著作，属于遗著的有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朱天俊选编）、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查继森整理）；属于新著的有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曹慕樊《目录学纲要》。台湾也出版了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吕彼得《中国目录学讲义》、李曰纲《中国目录学》。上述著作各有特点，为目录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从总体上看，都是以讲述古典目录发展为主的中国目录学史。

这些年来，出版或重印了一些文献学著作，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郑鹤

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等，除个别著作内容包括文献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外，不少仍然是校勘、版本、目录三位一体，其中目录部分实际是论述了中国传统目录学。近年程千帆、徐有富编著的《校讎广义》，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已出目录编，大部分内容也属于传统目录学范畴。

10年来发表的1695篇目录学论文中，据黄慎玮同志统计，中国目录学史论文476篇，占全部发表目录学论文的28%，居首位^{〔5〕}。论文作者从纵横两方面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

怎样研究传统目录学？是仅就古典目录的源流来研究呢，还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总结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义？显然按后者的思路进行研究较为合理，但研究是不够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深刻指出，“《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6〕}。这虽只是对一部目录的评述，但如果扩而论之，把传统目录学从文化史的高度进行研究，将是对学术巨大的贡献，将可改变整个传统目录学研究的面貌，也可影响与推动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当前需要的是从朦胧走向自觉，从表层走向深层，从微观走向宏观。这就是说，在文化史的视野下，既注意一部部古典目录的剖析，更要重视传统目录学学科的研究。彻底弄清中国传统目录学精华与糟粕，从而明确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这必然可以从传统目录学的一个侧面去窥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补充与贡献；又可以加强传统目录学的学术深度，正确总结中国目录学遗产。可喜的是，此种思路已有开端，钱振新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发表了《传统目录学的文化角度论》，但未引起注意。近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积明新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

书总目》，可算又是一例。作者指出以往人们对研究《总目》所持的“那种肯定《总目》的学术价值而否定它的思想价值，显然是一种文化理解上的失误”。这一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他又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包蕴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文化史家的任务，便是要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获它的灵魂”。其实又何尝不是文化史家呢？我认为不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传统目录学，就不可能对中国目录学史上诸多问题予以正确的解释，例如古典目录中文献分类的六分法、四分法的产生与演变的缘由等；就不能充分发掘古典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参考价值，例如宋代两部私家藏书目录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就不可能认识中国目录学发展的规律，从而正确吸收目录学遗产中的精华，发展中国现代目录学。

三、适应社会需要，发挥 应用目录学的作用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应用目录学更为体现目录学这一学科特点。早在清代，乾嘉学者广泛应用目录学于古籍整理，他们或注重考订经史，正订文字，选择善本，辨别伪书，辑佚文献；或通过文献分类、提要等，揭示古籍内容，条别学术源流，反映学术兴衰。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谈到目录学的意义及其作用时指出，今举古人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即：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用目录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以目录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因目录访求阙佚；以目录考之失佚之书；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与史学研究关系尤为密切。柴德赓在介绍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经验时指出，“目录学是搞学

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学问。一个人要搞学问，必须掌握目录学”。他称赞“陈垣先生目录学知识是极其丰富的，在他手里发展成为史源学，把编纂学向前推进了一步”〔7〕。由此可见，目录学在查考文献与史料探求方面，可给史学工作者以一定的帮助。

应用目录学发展到现在，它的内容包括编纂文献与利用文献两方面，即：论文注释、提要、文摘、索引、书目、综述、书评的编写方法与文献检索的方法。论文注释是论文正文的补充与解释。提要是一文的介绍或评介。文摘是一文主要内容的扼要摘述。索引是查考报刊文献及图书内容的检索工具。书目是一批相关文献的揭示与记录。综述是学术或技术专题文献的综合述评。书评是对图书的鉴定、评论与介绍。至于文献检索，这是查考文献及其信息的途径、方法与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献检索，仅指查考文献。广义的文献检索，除指查考文献外，还包括通过查考记载存贮在文献里的事实和数据。这种广义的文献检索，有些国家称之为情报检索。由此可见，文献检索与情报检索关系甚为密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文献检索是“从存贮的文献里查找出特定文献的过程。”可分为书目检索、情报检索和事实检索。

国内目录学新发展，如书目控制论、文献计量学也均属于应用目录学的范畴。书目控制就是通过建立书目集中管理体系，对文献流实行宏观控制，以便最有效地实施文献资源合理而充分的使用。文献计量学原称书目统计学，现亦称书目计量学，是将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文献研究的一门学科，以便帮助协调与解决文献积累与利用的关系与矛盾。它包括描述文献特征的研究与查考文献关系的引文研究。

文献在应用目录学乃至整个目录学研究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编纂文献、检索文献离不开文献研究。书目控制、文献计量学也早已突破单纯的书目研究的界线，而以文献与文献系统为对象进行研究。不了解文献就无法进行目录学研究，脱离文献的应用目录学是不存在的。

应用目录学领域广阔，有待开发、研究与实践。它的发展将把我国目录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由此总结的理论又可丰富目录学理论。

四、发扬历史传统，进行 目录学知识普及

我国大学开设目录学课程早就开始了。本世纪 30 年代初，著名图书馆学、目录学家刘国钧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时，曾讲授过目录学。此后著名学者姚名达、余嘉锡、容肇祖、刘纪泽、蒋伯潜、王重民等都曾开设过目录学课程，并编著过多种教材。目录学教育一直受到教育部门的重视。建国后，目录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它已被列为大学图书馆学、古典文献整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些高校中文、历史系也开设了这一课程。文化部规定目录学为图书馆工作者业务考核的科目之一。目录学教育作为一种学科的系统教学，在数十所高校开设课程，无疑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与提高。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录学课程设置不平衡，甚至出现有所削弱的现象。原因是各方面的，其中之一，有同志认为目录学已过时，主张以文献学，特别是情报学代替目录学。其实，三门学科，内容虽有交叉，但各有其对象与任务。相互补充，能促进文献及其信息的传递与利用，不必也不应相互代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目录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对学科建设与普及目录学知识都是不利的。

目录学教学要面对大学文科各专业，不

要局限于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积极发展专科目录学、应用目录学，为教学与科研服务。老一辈学者一向比较重视利用目录学研究学问，也有很多宝贵经验。读书治学过程中，借助于目录学知识，古已有之，这是好的传统，应予发扬。

当前中国目录学教育既有普及，也有提高的问题。没有普及，谈不上提高；不注意提高，也就不能适应社会上不同部门单位多种工作、多层次人员的需要。回忆五六十年代讲授工具书，还只是在大学课堂上；如今应用工具书检索文献，加以利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了。我们要着重研究现阶段目录学教育的任务，深入到社会文化、教育、学术界，使青年同志懂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学术研究，目录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

要努力培养目录学人才，切实改进大学目录学课程的教学，尤其要增强应用目录学的教学。讲授与实习结合，使学生能扎实地掌握目录学，具有编纂文献与利用文献的能力。期望在本世纪末，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普及目录学教育的新局面，正如中国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在 30 年代所说，“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

参考文献

- [1]、[5]黄慎玮.对八十年代我国目录学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第 2 届全国目录学研讨会论文,1991
 - [2]乔好勤.目录学研究综述.见: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 [3]曾令霞.关于目录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第 2 届全国目录学研讨会论文,1991
 -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21
 -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7]柴德赛.陈先生的学识.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1982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来稿时间:1991,11.编发者:刘喜申。)

ABSTRACTS IN PUBLICATION

(242~261)

Eighty year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s birth / Zhang Jihua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4).—3~8

1992 is the year of the 8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paper presents all-sidely but briefly the Library's history and status quo. With a collection of 16 million volumes and pieces, the library finds itself now in a central and pivotal position of the work of library automation, network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large-scale computer of gener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operated and the disc system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in the library.

National libraries—China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80th birth anniversary

G258.1

A Thought Given to Some Problems in Bibliographic Research / Zhu Tianju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4).—10~14

To build a scientific system of modern bibliography, a thought should be given to its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one. Bibliography has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has the features of our age. We should assimilate the essenc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and make the qualities of it be merged into the modern one. Thus far, the modern bibliographic system will be of more Chinese features than ever. Probe, inherit and bring forth new ideas. ref.7

Bibliography—China

Bibliography—Status quo

G257.1

Reading Guidance: the Main Channel to Seek Aft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 Li Jingfe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2,18(4).—15~19

Reading guidance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popularizing knowledge and linking up understanding. It brings to light the unit knowledge for the purpose of: 1)linking up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ranches of learning so as to make them merge reciprocally; 2)conducting reading guidance and reading analysis for the reader; 3)making studies on the reading materials so that knowledge will widely, rapidly, perfectly and accurately be recommended and introduced, the society will be promoted intellectually and the policy deci-